

中共武装起义后如何处理富余枪械

在中共武装起义的斗争中,由于人员流失过大或缴获颇丰,往往导致枪多人少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些起义中的领导人是如何对待富余枪支的?

南昌起义中初尝教训

1927年的南昌起义之前,中央的计划是,起义成功后部队折返广东,先取东江,获得苏联武器援助,再下广州,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

8月1日凌晨,起义爆发。经过激战,起义部队拿下了南昌城,缴获军械颇为丰富,共7000余支枪、80余万发子弹和数门大炮。起义领导人决定随军携带缴获的枪械弹药,但找不到挑夫就是一个大问题。彼时的行军打仗很大程度上都依靠农民充当挑夫帮助搬运物资。无奈之下,只能由每个士兵自行搬运武器。

正值盛暑,既要行军打仗,又要驮运枪械弹药,这是许多士兵没有经历过的苦和累。时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的周逸群后来在报告中提到:“为要多带子弹,只好每兵发给子弹二百五十发,甚至三百发。士兵因为天气太热,都不愿多背子弹,竟有暗将子弹投弃者……”

8月底到达瑞金、会昌后,起义部队与国民党钱大钧部在会昌发生激战。尽管大获全胜,但鉴于敌情变化,决定改道闽西,经过长汀、上杭返回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之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份太少。他们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却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

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而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仍然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几乎都是

广东东江。中途改道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枪械运输的问题。叶挺回忆会昌之战时说:“此时因携带空枪太多(十一军约5500支,贺龙部约2000支),若直接由江西回粤,因山路运输困难,无法携带,才改道折入福建省汀州,利用水道运输,并以二十五师护送。”

9月5日,起义军进入福建后,周恩来感到起义军历经激战虽然获胜,但兵员与子弹的损耗将成为以后的大问题,因此致信中央催促共产国际,一旦起义军占领潮汕地区应及时提供军援。但尚没等到回音,起义部队就在潮汕地区遭遇强敌围堵,最终不得不放弃潮汕,起义军搬运的枪支因形势危急也没能顾及,结果这批枪支大部分落入敌军黄绍竑部手里。

湘赣秋收起义中有失有得

就在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艰难转移时,毛泽东于9月11日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当时,5000余人的秋收起义部队中,大部分是工农武装,枪械不够,就以梭镖为武器。

起义部队原定的攻打长沙计划未能实现,毛泽东便率军南撤。到达江西莲花县集合部队时,整个队伍仅剩600余人,700余支枪。于是队伍缩编为一个团,继续撤退。

早在筹划起义之初,毛泽东就考虑过起义方

一失败后的情况,提出了“上山”这一条路。“山”即井冈山,但山中有王佐、袁文才率领的两支绿林武装,如何对待这两个“山大王”?队伍中有人提出消灭他们,但毛泽东提出,不要只想着消灭人家,要交三山五岳的朋友,团结改造他们,这样联合起来,自身壮大了,敌人就没办法了。

毛泽东提出把余下的100余支枪送出去,换取王佐、袁文才的支持。这个提议引起众人的反对。在枪械紧缺的湖南,每一支枪都来之不易。但冷静下来考虑,目下起义部队疲惫不堪,伤病员不断增多,枪扛着走没有用,用它打开局面,为部队换来休整空间或许更为有利。最终众人接受了送枪的提议。

10月6日,毛泽东等人来到大仓村与袁文才会面,表示愿意送上100支枪,这使得袁文才大喜过望。袁文才派妻弟谢富生接枪后,大大减轻了敌意,不仅回赠毛泽东几百块银元,并且答应愿意帮助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落脚,同时帮助毛泽东获取王佐的支持。就这样,井冈山的大门打开了。

平江起义中走出新路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以国民党湘军独立五师一团(彭德怀时任团长)为主力在平江县发动起义,不到一个半小时即占领全

城。7月24日,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全军2500余人,由彭德怀任军长。

攻占平江县城时,起义部队不仅缴获民团武装武器,还缴获了独立五师师部库存的大批弹药,总共有步枪近千支,子弹百万发。长沙的敌军三天内就会赶到,短时间内如何处理这大批的枪械弹药呢?

紧急时刻,新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连忙调来地方党组织来帮助处理枪械。7月23日,平江县委负责人来到县城,组织群众连夜把缴获的大批军用物资、枪支弹药运往黄金洞山区,成立农民自卫队。

据平江游击队党代表钟期光回忆,起义后,平江县全县赤卫军一改以往梭镖军的状况,发展到枪械齐全的五个大队,一个大队大约是两个连的规模,实力大增。就连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也感到恐惧,称彭德怀率领的起义部队“未可轻敌”。

红五军撤出平江后,历经45天的反湘鄂赣三省“会剿”战斗,兵员与子弹消耗很快。原本的2000余支枪,只剩下五六百支。但得益于各地群众武装的发展,在历次挫败后,红五军都可以获得补充。

从以上三次起义我们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在革命逆境时不断尝试,从而逐渐使中共革命运动成熟起来。 李里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选择向忠发

知识分子。这又一次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恶感,于是他们认为要正确进行中国革命,必须大力提拔工人干部,实行领导机关工人化。

1927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当时,向忠发是比较有影响的工人领袖,中共中央决定派其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10月15日,

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两个武汉工人和五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

11月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向忠发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参加纪念活动,到处作报告,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纪念活动结束后,向忠发继续留在苏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

作。在1928年2月上旬,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向忠发参加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与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向忠发在会上的报告中批评中共中央,指出中央领导人错误屡犯错误,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向忠发的发言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国际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共产国际于是决定选一个工人出身的人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们的目光很自然地就选定了他们熟悉的向忠发。 刘晶芳

古人过冬花样百出

在没有空调暖气、手机电视的古代,如何抵御严寒,消磨时光,度过漫长的冬季?聪明的古人为过冬,可谓花样百出。

早在文明诞生之初的史前时期,古人就学会利用建筑来取暖。半坡聚落的房屋建成半地下室样式,中间有一个坑可以烧火取暖,称之为火塘。秦汉时期,古人发明了火墙。墙的内部是中空的,里面放上柴火,把墙烧热后,整个屋子都会很暖和,很像现在东北地区的火炕。

从西汉开始,用花椒作为建筑涂料来保暖,成为王公贵族过冬的独家法宝。花椒磨成粉末掺到胶泥里粉饰墙壁,会释放出温和芬芳的香气,再挂上锦绣壁毯,设上屏风等,颇有一番西域风情。《陆氏诗疏广要》曾记载:“汉室皇后称椒房,取其实曼盈升,以椒涂壁,亦取其温暖,故长乐官有椒房。”后来,“椒房”几乎成了皇后的代称。当然,一般的达官贵人也会在家中修建暖阁。有的暖阁墙为中空,在地底有一条通道,连接房外火炉,便于把热量传到屋内,或者是把与大屋子隔开的小房间,作为设炉取暖的小阁。

饮酒是古人驱寒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不过古人喝酒前,会把酒烫一下。不仅如此,古人还会吃“火锅”,所使用的炊具就是五熟釜,它可以烹饪多种食材,釜中有五个格子,不同的格子中盛满不同味道的汤汁,再将食材放入汤汁中烫熟,即可食用,与如今的“鸳鸯锅”颇为相似。到了后来,还出现了陶瓷火锅、涮肉火锅等。

古人对赏雪一往情深,而烹茶听雪也是妙不可言。古人喜欢用雪水煮茶,唐人陆龟蒙有诗:“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赏雪之余,还可观梅。唐朝著名诗人孟浩然曾骑驴在风雪中过灞桥,踏雪寻梅。

岁暮天寒,冷风凛冽。读书最能抵御精神的寒冬。古人爱读书,在寒冷的冬季也不会松懈。为了读书,有人程门立雪,有人囊萤映雪,有人绕着城墙走以暖足……在闲置的冬季,古人的精神过冬必不可少。

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过一个温暖的冬天早已不是问题,但是对古人而言,他们需要运用智慧,创造出一系列应对寒冷的办法,才能度过无数个寂寥的冬天。

何世放